

本土

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

饶芑子 费勇 著

以外

饶芑子 费 勇 著

本 土 以 外

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饶芃子,费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

ISBN 7-5004-2385-3

I. 本… II. ①饶… ②费… III. 汉语-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海外 IV. I10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5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育才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216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责任编辑 徐海涛
责任校对 萧冰
封面设计 朱虹
版式设计 李建

自序

对于 19 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学术界曾以不同的概念去涵盖，例如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 世纪中国文学等，这些概念都曾在特定的时期发挥过作用，尤其是“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更是意义深远。然而，要想真正理解古典文学终结以后的广义的现代文学，非得确立“现代汉语文学”观不可，只有在“现代汉语文学”这一鲜明的语言标帜下，许许多多由意识形态或区域间隔等形成的边界才会消失。此类边界影响我们对文学历史的总体把握，更影响我们对于“汉语性”的体认。例如，在 80 年代谈到意识流文学，在一般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或史论中，都只提到王蒙，以为他是东方意识流的开拓者，而遗忘了 30 年代施蛰存的创作，以及 60 年代刘以鬯在香港的创作，施与刘氏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边陲化的存在。而事实上，只有将不同时空中的汉语写作加以综合，才会真正领会诗学上的“意识流”意味着什么。

自 90 年代以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本世纪的现代汉语文学存在着一个边缘空间，即俗称的“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因为政治的、文化的、地域的原因，它们成为大陆本土的“边陲”。但如果不对“边陲”的存在加以梳理，就难以对本世纪的现代汉语文学作诗学上的提炼，从而形成现代的切合本土的“汉语诗学”。

本着这样的企图，我们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对于边陲地带的文学现象，或被忽视的文类、作家作品等作了讨论，以引起关注。虽然书中的文章有一大半由两位作者各自写成，但基调是一

致的，那就是，在现代汉语文学的整体意识中观照各种边缘性的创作，一方面为“现代汉语诗学”的建立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开辟新的路向。

由于学识与能力的局限，本书离我们的目标肯定还很远，我们期待着批评与指正，以期在将来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这一耐人寻味的课题。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边缘研究:方法与态度	(1)
-----------------------------	------------

文化·历史·审美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对话	(2)
-----------------------	-----

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	(7)
-------------------	-----

海外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问题	(22)
------------------------	------

海外华文文学整体观	(29)
-----------------	------

第二辑 海外汉语写作的文化意蕴	(39)
------------------------------	-------------

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	(40)
-------------------	------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	(52)
-------------------	------

菲华女性写作的文化精神	(65)
-------------------	------

第三辑 边缘与本土的对话	(73)
---------------------------	-------------

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	(74)
-------------------	------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	(84)
----------------	------

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	(91)
---------------------	------

文华影响的“宫廷模式”

——《三国演义》在泰国	(99)
-------------------	------

第四辑 区域性与文类	(107)
欧洲华文文学简论.....	(108)
东南亚华文文学简论.....	(114)
澳门当代华文散文简论.....	(119)
澳门当代汉语诗歌的本土性与当代性.....	(124)
言情小说:欲望释放与情爱幻觉.....	(137)
论香港的新武侠小说与科幻小说.....	(144)
90年代汉诗的“介入”现实.....	(175)
 第五辑 整体意识中的作家作品	(181)
张爱玲《秧歌》与“1949年革命”的文学书写.....	(182)
诗与现实的辩证	
——论简政珍的诗歌.....	(189)
心灵与人性的雕塑	
——论司马攻的小小说.....	(213)
艺术的心境	
——论司马攻的散文.....	(221)
茉莉花串	
——论梦莉的散文.....	(228)
孤绝的中国人与漂泊的中国人	
——论马森《生活在瓶中》与《夜游》.....	(239)
幽禁中的守望与浮世里的追寻	
——凌叔华《绣枕》与严歌苓《红罗裙》.....	(248)
作家的心光与作品的亮色	
——论白洛的小说艺术.....	(256)

第 一 辑

边缘研究：方法与态度

文化·历史·审美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对话

费：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者日益注意到，在大陆以外的广泛区域如台、港、澳、东南亚、欧美等，存在着一个华文文学创作圈。

饶：关于这个世界性的华文文学现象，有不同的命名，如“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也有单独以大陆以外的某一具体地区命名如“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等等。

费：每一种命名背后似乎都含有特定的文化、学术背景等的不同，其内涵和形态同大陆文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台湾文学”一词就相当复杂，在台湾，这个词汇有时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

费：不过，撇开这些不同命名的不同背景，一些基本的共同点还是可以被找到，并被共同体认的。

饶：我想，不管有怎样的争论，不管有怎样的解释，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谁都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命名所指涉的文学现象都是用汉语创作的，都有华族文化的基因。

费：所以，有时候，我个人非常喜爱使用“汉语文学”“汉语诗歌”之类的命名，有一种家园感。

饶：以区域或以人种或别的什么来命名，有时确会遮蔽某些本质性的因素，或者说，会使研究者在作学术探讨时受到某种局限。近30年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汉语文化圈内的交流相当

频繁、普遍，即以文学杂志来说，绝大多数权威杂志的刊载面都辐射到本土以外，均标榜涵盖大陆、台港澳、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家的身份也日趋复杂，流动性也极大，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与本土形成了种种难解的纠结，汉语写作成了他们最后的坚持。另外，大量的官方或非官方召集的文学交流活动，均以促进“中华文化”凝聚力为号召。一种“整合”的愿望，一种“中华文化”一体化的愿望，在华人社会中，是很强烈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华文文学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中的许多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区域性的问题。

费：因此，您在90年代初就多次提出要从文化的、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华文文学。我想这不仅仅表达了对于提高此一研究领域学术品位的强烈愿望，还有更深广的思考。

饶：可以说是基于两方面的思考，一是既然都以汉语为创作语言，那么，汉语所固有的文化底蕴，或者说，文化血缘性，对于不同区域的作家肯定具有某种共同性规范。这牵涉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二是上述的共同性规范在不同的区域又是怎样呈现的？这涉及到文化交流、传播演变诸问题，这里就有一个不同区域创作状态异同的比较问题。

费：对于区域性的关注，如果没有狭隘意识，而是具有较宽广的胸怀，那么，就能发现许多具体而深刻的“意义”层面。普遍性与区域性这一对矛盾，是人类物质精神生活中相互消长、不可分离的两极，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关键仍在于研究者的意识、态度。

饶：陈寅恪先生曾说：一个学者必须具备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两种素养，否则不可能达到学术境界。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已取得不少成绩，许多学者开拓性的成果令人感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就会产生所谓的学术危机。如何使这一研究领域更深入、更具学理性，值得认真思索并付诸学术实践。

费：大陆学者在评价海外或台港作家时，存在着一些盲点。有时简单地以“现实主义”为标准，表面化地认为凡是“反映现实”“反映乡土”的就是值得肯定的，竟将某些“台独分子”的言论引为“知音”，令台湾地区的学者惊愕不已。有时将凡是“怀乡”的题材简单地冠以“爱国主义”之类，也令人啼笑皆非。有时又是“原则”的丧失，惟“海外”“台港”为是，缺乏基本的学术人格与批评品位，实在令人忧虑。

饶：要使混乱、无序变得澄明、有序，一方面要强调整体意识，就是说，学者要有广博的知识背景，一些前提性的问题也许应当了然于胸，例如，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的基本主题，近现代华人的海外漂泊史及其心路历程，再如更具体的，像台湾社会的特殊个案、香港的殖民化等等。所谓整体意识，只不过是要把个别的现象置于整个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来考虑，以期达到厚重、深邃的研究品格。当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要直接地标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意义，但这种观念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学者面对每一个研究对象时都有“整体意识”，那么，他的角度、他的行文等等，肯定会与一般的平庸之作不一样。

费：一些文章之所以有隔靴搔痒之感，抓不到要害，可能就在于对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体认不够。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怀乡”之类的题材，之所以简单地被纳入“爱国主义”一类的框框之中，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本身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放逐背景缺乏认知、感受，而忽略了其中包含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情结。

饶：另一方面，还应有“具体意识”，应当对于每一个对象特殊的生态环境有独到、全面的认识。例如华人在每一个区域所遇到的境遇很不一样，每一代之间的思想感情也不一样，每一个区域的文化也不一样，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些“不一样”，因为这些“不一样”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费：我们对于华侨华人在海外的身份认同问题、文化承传问

题等等有关生存问题，缺乏足够的注意。其实，这些问题要是不加以透彻的研究，就无法诠释某些文学创作。

饶：还有一个知识背景问题，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回顾近现代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诸如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现实主义问题、浪漫主义问题、现代、后现代主义问题、女权主义问题等等，都是本世纪文学界乃至文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例如，后现代的话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都市文学话题，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大陆几乎有同时的回应，理论的、创作的均有实践，其间的关联就耐人寻味。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背景，就很难与本土以外的学者对话，更不要说与汉语系统以外的学者对话了。

费：对话的阻塞有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某一方的知识欠缺造成的。台湾一些理论家批评大陆某些评论家概念混乱、胡搅蛮缠，指的是他们对于“现代主义”不了解。反之，台港的一些学者有时由于对“革命现实主义”缺乏认识，会对大陆文学的评论出现知识性错误。

饶：有时也反映出审美上的缺陷。对于作品没有感觉，没有审美能力，拿一些条条去套，于是，一些低下的作品也在“海外”“台港”的名目下得到极高的评价，令人困惑，也令本土的作家感到极不公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有时可以延伸到文化的层面，暂时将审美性搁置，比如我们在探讨早期马华劳工生活状况时，将一些劳工的打油诗作为研究素材，加以评价。然而，当我们在文学的界域内进行批评或史的描述时，审美意识几乎是最为重要的。没有对美的感觉，就谈不到文学创作或研究、批评。我们不能让自己就审美判断屈服于恶性的商业或政治干扰。

费：广告式的文风，浮光掠影的浮躁学风，使学术研究品味低下。说到底，学者应当怀有对真善美的向往，至少，应有一种境界或者胸怀。

饶：审美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的交融实则上包含了对真善美的认知。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这些素质性的东西具备不

具备，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华文文学的研究似乎应特别强调这三者的交融，因为这个领域涉及到文化、历史、美学的诸多层面，包含着许多跨学科的课题。以为华文文学研究是一条学术捷径，确是很大的误解。

费：可怕的是有些研究者怀着这样的误解而进入这一领域。

饶：尽管问题不少，但这个研究领域仍是充满希望的。不同学科、学养丰厚、知识结构全面的学者正越来越多地关注、加入这个领域，必定会产生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今天，一个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临。19 世纪末，中国人在巨大的变乱中满怀屈辱痛苦地寄望于 20 世纪，为此，无数的中国人奋斗了近 100 年。在 20 世纪末，回首前尘，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心情展望 21 世纪？我们将如何重新建构汉语的美感经验？如何重新确立以汉语为基础的中华文化之信仰？如何超越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一体化与区域化的冲突？如何超越意识形态的歧异而趋于文化的聚合？也许是我们这些依赖汉语进行思想的人所应具备的文化关怀。如果将这种文化关怀注入华文文学领域，应可以给这个领域带来一点新的学术气象的。

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

(一)

1979年北京的《当代》杂志发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这是大陆文学界首先注意到在大陆革命30年的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复杂的文学空间。随之而来的便是“台湾文学”与“香港文学”的命名以及这种命名带来的介绍与研究热潮。1982年召开了全国首届“台港文学讨论会”,到1986年召开第三届时,更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意味着大陆学术界对于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差异性的认知,也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这样一个特殊命名的确立。1990年召开第五届时,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至此,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空间都被清晰地显示出来并进入文化领域的操作层面及学术领域的对象之中。

90年代初期,对于“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界定显得极为迫切。《台港文学导论》、《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史》^①等著作相继出现,这些研究者将“台港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视作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所以,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论证为什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增添这样的命名,意义何在?台港澳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文学自然也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因历史上殖民地、政治分裂等因素,“三个地区出现三种社会,分属三个政府”,^②因而,有

必要将它们特别从“中国文学”的概念中拈出，予以特别的关注。潘亚暾等这样阐述他们的基本立场：“从中国当代文学总格局来考察，台港澳文学无疑是‘边缘文学’，它们是母体文学的一种延伸、补充和扩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③海外华文文学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大陆论者极力澄清他们不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支流，他们的主要理由似乎以国界为依据，只要在中国以外的另外国家发生的汉语写作，均属于“海外华文文学”。例如：

陈贤茂说：“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④

王晋民说：“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本土之外，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之外，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与非华人的作家，用中文反映华人与非华人心态和生活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亚洲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非洲华文文学等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⑤

许翼心说：“华文文学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因此，华文文学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学，也不可以将海外的华文文学称之为海外的中国文学。”^⑥

这些看法强调的是区域特征与语言特征，在论著自身看来均十分科学与严密。证之于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战后的东南亚地区，应无丝毫异议。然而证之于战前的东南亚地区，或 60—80 年代的美国地区，情形的复杂性恐怕非上述定义所能包含。苗秀曾提到：“马华文学在其开始时期，本质上也是一种移民文学。早期的马华文艺写作人，也和 19 世纪初那些法国作家一样，大多也是流亡者一类。他们都是不满中国的黑暗政治，逃亡到星马两地来，他们有些是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失败后，在家乡无法立足，亡命而来的；另外一些则是为了生活，远走异地谋生，写作不过是他们一种业余工作，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是有意识地把文艺当作宣传武器，揭露中国的腐败跟落后的社会封建性。……马华文学

由移民文学蜕变为独立发展的国民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告完成。”^⑦

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以区域与语言为标帜的“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化界高频率的运用中，日益成为套语式的词汇^⑧，而很少有人去寻究这一命名本身的复杂含义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学术难题。

“海外华文文学”这一貌似简洁清晰的概念，触及到近百年中国的离乱历史，其中蕴含的风风雨雨、离愁别绪、沉浮荣枯，引起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结。从台湾、海外的某些作家、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反应即可见一斑。1985年秋，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举行了一个“海外作家的本土性”的座谈会，参加者有陈若曦、张系国、张错、唐德刚、杨牧等，均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命名所指涉的对象。他们发言的基调反映了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一说法的抵触、拒斥，他们均认为自身的写作充满“中国意识”，不应被逐出“中国文学”的大家庭^⑨。命名者与被命名之间的牴牾，耐人寻味，正好说明不能简单地以语词的逻辑性为终点，而是要透过逻辑性，窥测到隐藏于其间的逻辑以外的许多复杂的背景，才有可能整体地感受、把握一种命名的意蕴。其实，早在1983年，由海外作家自己编辑的一套“海外文丛”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这套书的取材范围完全是美国的华人，而且全是50年代前后从台湾、香港赴美的华人知识分子。透过这一套丛书，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心态与立场。

木令耆说：“在心理上，他们的感情寄托是在祖国，从他们的作品中常会看出他们的流浪心情，如果他们的作品为了迎合中国广大读者，在词汇、形式上努力去接近中国本土的作者，这将是他们对祖国怀念向往的结果。……现今的海外作家可能是最后一